

中国外交六十年：走过从前，走向未来

王逸舟

内容提要 本文将中国外交及中外关系的重大变化置放在三个“三十年”的重大参照系下，论述其“历史性变化”的含义；而将建国六十年外交分成“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并细分为六个小的时期，通过相关参数的设立和评估，阐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演进的，中国的外交又是如何提升的。

关键词 中国外交

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 100732

从研究角度看，从外交角度入手，分析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追踪新中国的外交六十年，存在着几乎无穷的路径和思路。比如，人们可以追溯中国几代高层领袖的外交大手笔、大战略，对于不同时期中外关系变化的奠基作用；可以探讨中国外交制度的调整及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对于全球外交民主化和制度化潮流的积极推动；可以分析中国大国外交的战略对话协作框架及设计，对于中国改善周边环境与发挥全球角色的作用；可以讨论中国“以人为本、外交为本”的新时期外交理念，对于当下中国外部形象提升的潜在价值，等等。这里，我想从中国外交发展的不同阶段着眼，对中国外交及中外关系历史性变化的线索作若干勾勒：首先，它把中外关系的重大变化，置放在三个“三十年”的重大参照系下。这是一个简明但显著的对比，展现了“历史性变化”的含义。其次，作者把建国六十年外交分成“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大历史性阶段，分别冠

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外关系”的称谓，再把六十年细化为六个小的时期，看看不同时期中外关系具体有何变化，研究它们间的递进与校正，关注彼此间的异同；在对六个时期的分析过程中，本文尝试不同变量的检测，看看外交视野中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如何演进，这一过程中我们国家的外交是如何提升的。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历史参照系

在笔者看来，具备大历史的纵深感，是恰当把握新中国外交地位与作用的关键之一。例如，无论如何抱怨现实的某些做法与说法，当中国外交被放置在更加宏观的历史镜头下，人们很容易纠正原先的误判与狭隘，立即看到新中国外交相对于旧中国的质变，和新中国外交内部不同时期的跃进。

1. 1919年—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

中外关系

评说当代中国外交成就及其对中外关系的作用,不能不对比近代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不能不提到以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为重要特征的近代中国外交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从1919年到1949年的这三十年,是研究新中国外交及中外关系的时间距离最近、反差最强烈的一个重要参照系^[1]。

1919年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高举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旗帜,对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推动和各种国内外先进思想的强烈追求,使俄国十月革命的精神迅速传开,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有了一种全新的变革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随后的中国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从那以后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可歌可泣的伟大解放斗争的三十年,是朝着结束百年来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和连年战乱的局面、实现国家独立的三十年,也是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壮大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在国内,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政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摸索了一整套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经验。在国际范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力量,逐步摸索“以俄为师”的各种办法,在主要从事国内武装革命的同时,争取尽可能广泛的国际支持和合作。革命根据地既是传播革命思想、积聚革命力量的播种机,又是向外部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之伟大意义的平台^[2]。在反法西斯斗争和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军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某些联系渠道,初步接触和理解了近代国际外交的各种知识与手段。如果说,在1840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尚未完全从旧时的朝贡体系和“天下”概念摆脱出来,仍然对于西方列强主导的近代国际体系困惑不解和无从应对,那么,从191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展开的伟大革命实践,则接受了最新的世界进步理念,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落后愚昧深刻批判,创造出富有战斗力和创造力的革命做法。这是有趣而富有动感的崭新画面: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实际的落后与被压迫状态,一方面是在中国革命者那里的新的气质与精神状态在不断孕育和壮大。这也是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一个破旧立新的过渡时期:

中国整体上被视为一个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中国的旧政权和各种旧势力的确腐败残破不堪,中国远远离开了昔日的世界中心位置,处于受支配、受压迫的边缘地位;以西方列强为主宰的国际体系,表现着恃强凌弱的霸权特征,对于维持中国弱小和被分割的实际状态心满意足^[3];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尚未掌握国家政权和外交工具,但他们代表的新兴力量日益强大和崛起,代表着中国广大地域和民众的要求,朝着夺取政权、实现革命的目标挺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段特殊“前史”。从客观形势上看,中国已沦为受帝国主义列强操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以前曾经有过的某些综合国力优势丧失殆尽,中国与西方主流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严重不平等、不公正的关系,诺大的一个国家被视为“东亚病夫”,完全谈不上对人类和国际社会的有效贡献与作用。另一方面,在这三十年间,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认清了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里落后挨打的悲惨地位,同国内的反动势力和支持纵容它们的外部强权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新旧力量的此消彼长和民心向背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沉睡的东方巨人开始觉醒,中国自身的革命和解放,中国参与的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对于国际体系的转变起到一定作用。虽然延安等解放区的对外交往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外交不同,但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同世界打交道,开始准备应对执政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国革命时代和观念,也给建国初期的中国内政和外交打下深刻的印记。

2. 1949年-1979年,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外关系

研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二大参照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也是世人所说的“毛泽东时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掌政权的第一个三十年,是很大程度上承袭革命战争年代的基本思路与做法,发展新中国的对外交往、确立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正式关系、定位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位置的“初级阶段”。

1949年的中国,在世界历史的画面中,是一个既强大又贫弱的国家,一个让社会主义阵营无比振奋、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惊恐担忧的国家,一个经济上远远低于世界人均平均水平、提供不出有任何吸引力的发展模式的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段时期的特殊国际背景,以及中国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特殊国内实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建国初期立即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方针^[4],从而使苏联模式得以在中国引进和广泛实施。新中国外交的最初阶段,深深打上了这一模式的烙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很快由战后一段时期表面上的与各战胜国的等距离外交,变成实质上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合作关系,不管是自觉或者被迫,这一位置适应了冷战开始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全球政治逻辑^[5]。应当指出,即便在冷战逐渐风行的时期,中国外交仍有一段努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自己与一大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结为同志或盟友的经历,它同时积累了中国外交制度化、按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社会对话与合作的宝贵经验。然而,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内外各种原因,中共与苏共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成为对峙的双方;随着这种大背景的转换,中国的外交也不得不向做出某些调整,朝着更加左倾的方向演化,它也加强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中国的怀疑和排斥的基本态度。到了“文革”时期,国内政治的某些极左做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损害了中国外交在周恩来主持下的稳健平和方针。必须看到,总体上逐渐偏向左倾的毛泽东时代,在最后阶段显现了某些积极的调整动向,尤其是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中美对话的开启,中国外交的钟摆再次强劲回摆,提示了向国际体系中心趋近的趋势。只是这种势头短暂且乏力,并没有像后来的邓小平引导的改革开放进程那样,能够全面引导中国走向国际体系的负责任大国位置。随着邓小平的再次受贬、毛泽东晚年的极左错误达到极点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的混乱失序,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整体形象和作用仍然相当边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对于中国这一时期的基本定位和外交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冲击^[6]。

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三十年,是既有伟大成就、也有重大失误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和具有崇高威望的政治人物,创造了一个拥有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红色政权,彻底粉碎了西方列强继续奴役中国、并用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梦想,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时代创造了不可逆转的坚实基础。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给几百年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宰的当代国际体系以巨大震撼和冲击。总体

上观察,新中国第一代掌权者基本上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与做法,尚未完全适应和平发展的年代对于一个熟悉长期革命与战争的政党和领袖的要求(不管是国内建设与发展,还是国际斗争和交往)。在对外关系领域,延续革命的传统与适合国际外交惯例两种线索之间的关系构成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微妙复杂的“双重变奏”。把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的中国对外关系,大体称作“社会主义革命年代的外交”,并不为过。不论这三十年间如何曲折,有哪些亮点和调整,大致的偏左方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只能基本上由此加以判别,即它是一种斗争大于合作、猜忌压倒协调、对峙多于对话的关系,是“造反者”对抗“权势者”的态势。

3. 1979年-2009年,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中外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三个大的参照系。鉴于邓小平的主要设计师作用以及江泽民、胡锦涛对邓小平路线的继承性,把这一时期称为“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提法对应)是一种有道理、有意义的说法,也可以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头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应”),或索性简称为“改革开放年代”。

与头一个三十年相比,“邓小平时代”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所有领域、所有工作完全转向服务于发展、有利于民生、着眼于综合国力提升的轨道,一切不适合这一重心的体制和观念都在进行这样那样的改革,对外开放、尤其对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开放与借鉴成为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这些转变与调整,使得前一时期的革命的、斗争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大大减弱。与内政相一致,中国外交工作迅速适应了新的主题与要求,努力营造着适合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氛围。邓小平对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一个具有转折性意味的重大判断: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中国应当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它与此前立足于准备世界革命、防备外来的各种帝国主义入侵、准备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的认识有根本差异,也正是这一点创造出新时期中国人全力搞建设的信心与智慧,鼓励了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交往与合作的勇气和办法。比较而言,中国这艘大船在毛泽东时代的主航标,是与形形色色的各种内外反动势力抗争,确保国家的政治独立不受干涉,并最终解决了“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课题,一扫百年来外部各种列强

分割欺负压迫之辱；它在邓小平时代的基本航向，则是努力推进使“中国人民富强起来”的目标，创造了改革开放的特殊机制，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激发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富裕生活的强烈欲望。这中间当然存在无数曲折与干扰，出现了各种问题与麻烦，不过总体而言，从邓小平执政的时期到江泽民接替的时期再到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当权，三十年间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航向始终没有改变，经济目标的优先性一直得到高度保障，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由此一步一个台阶不断迈向新的高点。这一大的背景，决定了中国外交的着力方向，也决定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善方向。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国让世界感受到逐渐壮大的实力与潜能，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与新貌的大国气象，以及中国公众深入了解世界和让世界更好认知中国的愿望；即便是那些对中国抱有成见与敌意的国家，也越来越无法压制中国的声音，无法把中国排斥在各种全球或地区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外。在世界范围，这段时期也恰好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化和一体化迅猛发展的阶段，中国在与国际经济紧密联系、相互协作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发展中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一个新的拉动力量，由一个地区性强国走向有全球意识和责任及影响的大国^[7]。

看待最近三十年的中外关系，必须从邓小平奠定的经济重心及其后果出发，由此分析中国力量的优势与不足、以及扬长避短的具体目标^[8]。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的一段时期，也是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地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提升的一段时期。从外交角度分析，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使中国与外部主流世界的关系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性质与态势，从原先的紧张和对峙局面，转向一种新的求同存异、合作对话过程；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中国越来越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中一个建设者、负责任大国与“利益攸关方”，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的份量与影响力，早已不是处在国际体系边缘的角色所能想象和具备。可以说，在21世纪初，由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新现实、和平发展及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加上一批主要来自发展中世界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体系越来越像一个富有动感的、充满变化可能性的格局，而不再是旧时那样由少数西方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长期主宰的某种“给定”样式。尽管这中间依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存在着某些怀疑与妨碍，中国在最近三十年的飞速成长进步，无法阻挡地带动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及人类进步之最重大、最积极的因素之一。因而我们也有理由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新世纪初期已越来越有建设性和全球意义。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

这里提到的“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并非标准的教科书提法，但是在笔者看来，它们不仅是研究者极为便利的分析框架，而且恰当地提示了我们进入细节的入口，以及面临复杂矛盾的具体现象时须铭记在心的大范畴大思路。给定这样两个大的阶段划分，我们可以将“毛泽东思想引导的时代”与“邓小平路线开创的时代”，细化为六个具体的时期，做有意义的对比。

它们分别是：

1. 探索新中国定位的建国初期（1949年—1956年）；
2. 苏共二十大之后的调整时期（1956年—1966年）；
3. 极左路线占上风的文革时期（1966年—1976年）；
4. 启动改革开放新航程的时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也即邓小平执政的年代）；
5. 冷战结束后的适应与调整期（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也即江泽民执政的年代）；
6. 新世纪以来的全新成长时期（中共十六大以来，即胡锦涛着手新的布局的年代）。

关于这些时期的具体内涵，学界和外交部门都有许多研究和公论，不必在此赘述。需要讨论的，是它们对外交的塑造影响及对中外关系的潜移默化后果。确实，衡量尺度的确立，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本报告提出的综合性视角的评估，把如下一些参数纳入，尝试建立一种比较直观和容易对照的画面（及结论）。这些参数主要包括：

- * 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保障与维护程度
- * 与我建交国家的数量及地域分布
- * 与邻国和周边地区的和谐程度（邦交、争端、战争或协作事件）
- * 重大外交战略（领袖人物外交思想、方略等）的出台（次数）及影响
- * 国民生产总值里外部因素（海外利益）所占比重
- * 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

* 全球政治与安全系统里的影响力（包括加入国际组织与提供公共产品情况分析）

* 作为中外关系变化折射之一的外交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程度

须指出的是，这些参数可以不断细化，对评估对象的分析将根据数据的获得而持续深入开展。下面仅仅是初步评估的结果——

对第一时期的分析及结论：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当代世界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几乎所有国家都意识到，毛泽东的中国不再是旧时那种仰人鼻息甚至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而是一个有坚强意志和独立决心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惟一的执政党是通过艰苦卓绝的战争胜利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赢得了治理国家的权利与位置。尽管台湾仍然被西方帝国主义大国实际支配，整体上中国大陆的版图不再受西方及沙俄列强宰割，而是真正处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自己的手中，这是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实现的国家主权的回归、有力保障与维护。1949 年至 1955 年也见证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建交浪潮，在苏联的带领下，有遍及欧亚非广大区域的多达 22 个国家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尽管尚未得到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也没有完全解决与多数邻国的边界划分纠纷，新生的红色政权第一次获得了世界范围的承认^⑨。新中国外交掌舵人周恩来最早设想的、并且与主要发展中大国印度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万隆会议和其它场合得到一定程度的响应与传播。同时，应当指出，这一时期的中国距离国际体系的中心位置仍相当遥远，冷战开始后的全球对峙态势已折射到中国同西方主导的、联合国为象征的国际社会的关系上；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及多个重大国际组织之外，因而只能选择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靠拢的方针，苏联模式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在中国全面输入和扎根；毛泽东用“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形象说法，提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重大抉择。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二战后一度出现的国际缓和与合作气象中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总体而言不能用“和谐”与“合作”表达。中国经贸关系也是单一朝向的，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为主，加上一定数量的苏联援助，海外利益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在世界经济中

的比重近乎微不足道。在百废待兴的前提下，中国人也没有可能提供多少全球公共产品，加入的国际组织数量十分有限（主要是参加了由苏联集团建立的一些国际机构，例如在工青妇及和平运动领域）。作为中外关系思想理论和教学一种折射的国际关系及外交学，在建国初期的中国十分薄弱，只能借用稍许改造后的旧中国存留的一点底子（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开始了起步的努力。

总之，在第一时期，新中国与外部世界刚刚开始磨合，两个阵营的压力与影响逐渐呈现，探索定位的努力有了一定成绩，但客观形势制约的总的内政和外交方位，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倒向苏联、与西方冷战架势对峙的大局。

对第二时期的分析及结论：

1956 年至 1966 年，是国际共运历史上一段十分特殊而重大的时期。虽然东西方对峙及冷战的总体局面没有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这一时期却出现了深刻的裂痕。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随后发生的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掀起巨大波澜。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先是惊愕不解，继而强烈抵制，最终选择与苏联分道扬镳。不论后人如何判断中苏分裂的原委与责任，包括毛泽东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态度与决定，就中国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判断，这场争论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开始向更加左倾的方向调整，国内一波甚于一波的“革命运动”给对外工作形成直接的压力，中国人的世界观与全球战略更加注重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在这一时期的国人那里，除开原先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外，又增加了对苏联老大哥控制野心的担忧，维护国家主权的任务似乎变得更加繁重而不易。这一时期中国同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更显密切，在新建交的 27 个国家里有 24 个属于“穷兄弟”。中国与多半为非社会主义的邻国的关系却没有多少改进，邦交正常化及解决领土争端的事宜没有积极推进迹象，与印度的边界战争暴露出本应患难与共的两个发展中大国关系的脆弱。像前一时期一样，世界经济与中国的联系仍然很少，外部迅速发展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科技进步，对于这个人口大国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建国初期一段时期来自苏联的援助突然中断，也对新中国本来薄弱的工业基础造成不小的打击。有意思的是，作为中苏决裂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中国在一些既不愿受西方资本主义支配、也不希望依附苏联阵营

的国家和地区那里受到欢迎与拥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重要成员、后者是中国的天然盟友的思想得以萌芽,为下一时期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论断奠定了基础。“文革”前这段时期的另一个积极动向是,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政治教学工作得到由上而下的推动,毛泽东、周恩来都感受到培养自己的国际斗争及交往人才的迫切需要,因而建立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所^[10]和大学专业系及课程(典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北大、复旦、人大三所大学的国际政治教学系)。

在有关国内政治的权威解说与教科书里,“文革”前的十年通常被认为是犯各种错误但同时富有改进和成长潜力的一段时间,只是后来这一进程被极左路线所中止。事实上,在笔者看来,“文革”前的十年与“文革”本身的十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存在着由弱至强、从小变大的一条线索,即毛泽东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上所强力推动的“不断革命”,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导向^[11]。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外交温和思想与合作方针受到了一定压抑,它与国内经济社会建设领域的类似情况是一致的。在外部的强权打压与内部的左倾影响之双重作用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朝着紧张的方向演化。

对第三时期的分析及结论

1966年至1976年,也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留有惨痛记忆的特殊时期,也是当代中国迄今为止与外部世界关系最紧张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的开始,中苏决裂到了高点,两个曾经的盟友一度剑拔弩张,由珍宝岛冲突点燃的火种几乎引发全面战争;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关系似乎仍然是一种相互敌对的态势。可以说,这时中国人面临和感受的是最严峻的安全压力,一种史无前例的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封锁遏制的局面。在国内政治的背景下,极左路线达到极端状态,各方面的生产和建设陷于停顿,被迫服从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铲除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代名词)祸根的总体要求。显然,外交工作不可能不受到消极影响:除开“三砸一烧”(砸印度、印尼、缅甸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代办处)这类有影响极恶劣的行动外,世人见到了中国提出的“解放仍在受苦受难的三分之二地区”和实现“世界一片红”的口号,见到了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和非洲一些国家类似“输出革命”的做法,见到了

不惜代价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国家间关系,见到了全球各地反帝反殖力量对毛泽东思想和政策的此起彼伏的呼应(即便仍然处于相对弱势位置),见到了一个位于东方的、有别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苏式战略的另一个红色中心。有关世界史的一般教科书,记录下的主要是上述情景,即中国与主流国际社会及主要阵营的全面对峙。然而,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在看上去“全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造反派外表背后,实际上从70年代初开始,中国外交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导下,出现了静悄悄而果断的重大调整,以适应美苏争霸全球、给予中国夹缝中求变及生存的机会的局面:“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中间地带学说的重大发展,确定了在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一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多数国家的第二世界、以及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的中国定位,即反对第一世界的霸权、争取第二世界的合作、支持第三世界的事业;利用美国人对苏联的恐惧,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对话及缓和的大门,从而使中国的安全压力大大缓解的同时,其全球战略位置变得有利和灵活;得到第三世界广大新独立国家支持的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等主要国家组织中的席位,从而为改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开辟了可能,也为后来邓小平的开放改革政策事实上提供了某些条件。虽然后面提到的这些变化并没有根本改变扭转极左年代的内政氛围,没有根本改变中外关系上的紧张对峙局面,而且不被当代外国史家视为主线而记录追踪,但它们是分析一个完整复杂的画面所不可或缺的成分,是解读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承前启后与历史巨变的钥匙之一^[12]。像前一时期一样,从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保障与维护程度衡量,呈现出来的是两面性:一方面毛泽东的中国成功维护了自身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另一方面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尤其是60年代后期)。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中国与美国的相互交往,引发多国争先恐后与中国建交的新一波浪潮,包括了一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66年至1977年有62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孤立中国甚至消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阴谋彻底失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了独立不羁的强大政治形象,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包括他发明的游击战理论)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不过,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仍然远谈不上和谐:中苏边界问题严重存在,中国受朝鲜半岛

的冷战形势严重制约,中国直接参与了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与南亚的印度的关系是冷淡的,中国与东盟各国严重对立,这些折射出“文革”时期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特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仍然边缘化,国际贸易和此时如火如荼的全球科技进步浪潮对这个大国仍然是无关紧要,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很多国家视为一个有输出革命抱负和具体战略的威胁。不用说,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各种事业的发展相当停滞和缺乏活力,有些领域和部门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工作无例外地受到冲击,大学和研究机构先是“关停并转”、后来虽然有所恢复却成效甚微。

总体而言,“文革”十年给毛泽东时代的中外关系以严重的消极影响,建国后温和路线和极端路线的较量,最终以极左势力占上风、到极度直至盛极而衰而结束。不管中国外交部门做了多少挽回努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好斗形象逐渐被定格、固化和传开,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整个外部社会的关系上“斗”多于“和”。但是,辩证法教会人们,事物发展过头,会朝相反方向转化。

对第四时期的分析及结论

以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它既是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阶段,也是中国与各方面关系突飞猛进的全新阶段。在新中国历史上,邓小平是第一个提出了有别于毛泽东的重大战略思想和论断的重要领袖,对于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三十年中国的航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尤其在邓小平本人执政的时期(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对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定位,他做出了两次极其重大的贡献:首先,为了启动改革开放航程,邓小平做出了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当今世界主要问题、中国应抓住时机搞“四个现代化”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判断。由此中国内政外交出现了一系列新举措、新方针、新布局,如:依据现实的变化,同时与美国和苏联改善关系(中美建交、中苏开始关系正常化谈判);正式宣布了不结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外交工作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大力招商引资、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发展与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经贸关系;提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绝不等于贫穷落后,鼓励尝试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建立经济特区和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及

用“一国两制”谈判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大力消除各方面对于发展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种种疑虑。正是这一切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恢复了生机与活力,迅速培育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与制造基地,一举改变了中国经济成长乏力、缺少致富路径、与世界经济主流格格不入的局面。从邓小平执政时期开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大幅增加,外部因素对于中国发展的贡献度迅速上升,中国人对于全球经济和人类发展也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巨大能动作用。其次,在“六四事件”之后的一段特殊困难时期,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极力制裁和改变中国的不利国际氛围,也面对国内种种困难和混乱乃至非议的巨大压力,邓小平做出了对外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内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经济建设仍为全局重心的战略决断。这一时期他有关国际形势的各种重大判断,有关在艰难时境下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机遇的一系列方针,如对苏东解体原因的分析、反对美国霸权及西方制裁的办法、国际时局的长期走向、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的新挑战、中国即便将来强大了也不当头不称霸、中国不搞阴谋只有阳谋等精辟论述,不止在当时引导中国渡过难关、转危为安,至今看来它们仍然具有强大鲜活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邓小平执政时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当代中国外交史上继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之后另一伟大遗产,是长久散发光彩和被后人铭记的光辉一页。在邓小平执政年代,总体上观察,中外关系的发展有着一种全新的量的扩展与质的提升。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保障与维护程度,与我建交国家的数量及分布,与邻国和周边地区的和谐关系,国民生产总值里海外利益的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与作用,以及中国人对于全球安全和政治的看法及影响力,乃至中国国际关系学和外交理论研究的兴盛,都有极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全新气象与进步,同时为此后的充实、完善和提高奠定了明确方向与扎实基础。也正因如此,人们把当下的时期仍然称为“改革开放阶段”,仍然把邓小平理论视为指导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想学说之一,今天的中国仍然被很多外部观察家称为是“邓小平的中国”。

如果说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那么邓小平则是当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建筑师,他们俩人,一个创立了新中国并给头三十年刻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烙印,一个启动了改革开

放的航程并给最近的三十年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标记。邓小平执政的那段时期,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奠基期,经受住了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辟了与毛泽东时代完全不同的新发展期、新合作期。中国的国际形象,也由过去那种比较边缘化和“造反者”的角色,转向现在这种比较负责任和“建设者”的位置。“邓小平现象”(或者说“邓小平进程”),仍然是一个当下的进行式。

对第五时期的分析及结论

在邓小平之后,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了改革开放的大业,率领中国渡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整个20世纪90年代既是全球范围的适应与调整期,从中国的特殊角度观察,它同时是中国从“六四”后受西方制裁和压力的阴影中走出、恢复改革开放之初那种强劲发展势头、迅速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前列的时期。这段经常被外界视为“过渡时期”、被国内很多媒体形容为“承前启后”的时期,实际上经历了大风大雨和各种艰难考验,却总体上实现了安定和谐、平顺向上,是非常不易的、值得一书的。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看,在实践层面,沿着邓小平开辟的航向,中国政治领导层和外交部门有效化解了美国及西方的制裁和围堵压力,使中美交往中的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脱钩,缔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大力拓展了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互利关系,平稳实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在经过多年谈判之后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妥善处理台海危机、北约飞机炸馆事件、美国间谍飞机入侵等重大危机;在战略思想层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在国内发展上创立了“三个代表”的重大学说,而且在对外关系上全面深刻论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与基本步骤,提出“重大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率先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地区)宣示了“平等协作、互利共赢”的新安全观,并且对国际社会阐述了不同社会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的方针,丰富和发展了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邓小平外交理论、战略与国际关系实践。依照本文提出的衡量框架,在江泽民主政的十三年,中外关系的各个重大指标都有相当的提升和加强。例如: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得到新的保障(以香港澳门回归为突出象征);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新的突破(在保持朝鲜的传统友谊的前提下实现与韩国的建立是一个典型);同周边国家的和谐程度得到加强(特别是在解决边

界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了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关系);提出一系列重大外交方针和国际战略思想(新安全观、新的发展观、新文明观,以及战略机遇期概念);中国国家利益中海外利益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提高,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加入WTO是一个里程碑);中国在全球政治与安全系统里的影响力得到增强,开始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与战略外援(中俄主导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样板,中国对阿富汗的大量经援是另一个典型),学界有公议的一个看法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学的研究及教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继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启蒙运动(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加强引进和学习过程)之后的又一段“黄金发展期”。尽管这一时期也有各种不足与遗憾,如台湾问题作为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的逐渐升级,中日关系相对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和中欧关系而言进展缓慢,中国与非洲传统友谊面临新的难题,等等,但瑕不掩瑜,它为当下的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而且总体判断,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新突破,中国实现了又一段跨越式成长。

对比江泽民的十三年的开始与结束,不难见证巨大的反差(与进展):苏东剧变及“六四”事件后,一度风雨飘摇、形势恶劣,国际上多不看好中国的前景,认为它将步苏联解体的后尘;而当江把接力棒交给胡锦涛时,这时的中国已俨然是国际力量格局中最有希望的新兴大国(乃至出现了各式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这当然与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集体及外交部门的辛劳智慧有关,但它更是千百万中国人的心血、力量与成就所致,是改革开放总体方针延续与升华的结晶。

对第六时期的分析及结论

中共十六大以来的这段时期,是继邓小平、江泽民之后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新阶段,也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达到新的高度、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对外关系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站在全球角度观察,当下的时期同时是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性大国以及国际力量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全新时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与压力急剧上升、中国快速增长的海外利益同原有国际秩序经历复杂磨合的全新时期。在国内背景下,新一代领导集体制订并提出了“以人为本”、推进“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等重大战略口号及目标,深化和丰富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在外交工

作中,与内政的要求相适应,同样制订和推进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及要求)——例如,提出了“外交为民”的方针,外交领事保护制度出现了重大改革,不断适应着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向国门、走向世界的新形势;高层领导在国务活动和世界讲坛上大力倡导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口号,外交部门在具体推动建设和谐的周边关系、有协调的大国战略对话与伙伴关系、实施与发展中世界的新型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及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机制并发挥更大作用方面,实施了大量有创意有成效的行动;胡锦涛本人近一时期内外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统筹两个大局”的指导方针,使得中国的对内对外工作有了新的大国气象和风范。在这一时期,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更加务实、亲民、谨慎的要求一致,中国外交制度也有新的建设与发展,例如:推动的新一轮外交礼宾改革,更加务实、精干和节约;外交部增加了直接为百姓服务的诸多安排,像设立外交公众活动日,成立公众外交处,逐步开放外交历史,各级外交领导上网与网民对话,设置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机制,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等等。中国的多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均有创新与突破,如召开大规模、有影响的中非峰会,建立与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以及各个地区强国的双边战略协作与对话框架等,丰富和加强了中国外交的渠道及影响。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在注重维护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和主权安全的基础上,加大了对国际义务与责任的投入,中国人担当了更多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制度的高官、参与了更多重大国际规则的制订,涉及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维和行动、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法庭、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等不同领域和机制;中国在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全球贸易新一轮谈判、全球金融改革与危机应对、全球防扩散与反恐怖、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大改革中的不可或缺作用,得到日益广泛的承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新世纪之初也达到了历史的新高:中国已和全球170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与200多个国家及地区建立了经贸联系和其它合作关系;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最大的新兴市场 and 外资投向地,主要大国中增长速度最快和持续能力最强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新时期发展有显著拉动作用的金砖四国的“领头羊”。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家权益的保障程度、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重大外交方略的出台次数、中国对于

全球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和对于国际安全的保障力,乃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的进步步伐,等等,都是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然而,也应当看到,当中国人站到全球新的高地上,既看到更大更美的风景,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感受到“高处不胜寒”、“树未大先招风”的特殊压力与孤寂,一种在过去罕见的外部“呼吁与要求”:中国经济的成长及强劲对外需求,被很多国家和声音视为新的“中国威胁论”或“新殖民主义”的根源;中国与一些与西方有矛盾的国家的正常经贸交往,被解读为“培植势力范围”和对抗现有国际制度;甚至北京奥运的成功,也强化了外界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的质疑;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曾经是中国传统盟友的第三世界兄弟,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开始向中国伸手要钱、要援助、要承诺,其中很多超出中国能力所及和中国公众的想象(思想准备)。中国外交提供的战略外援和国际公共产品,相对于其他世界大国,尤其是老牌西方国家,仍然有一定的差距^[13];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国公众的期待有距离,与中国的经济成长速度和规模不太对称,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当代政治文化独特大国的身份不一致。中国在新时期新起点上与外部世界的磨合,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充满挑战的过程。

经过最近三十年的卓越努力,中国站到新的制高点上,中国与世界关系也具备了不同以往的面貌、性质和潜能。总体上判断,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进程,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功的最大来源,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外交理念与实践的主要动因,当然还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出现全新局面的根本所在。当下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推进的大业,是对上述基本线索的延续与扩展,是改革开放进程的新阶段、新贡献;中国与世界在新世纪初期的关系,由此展现出新的前景、新的亮点。

注释

[1]认识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外交方位,不能不深刻了解它此前的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历史是传承的,影响是深刻的。这方面最好的作品,仍是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深入研究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读一下这篇名作。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344页。

[2]除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那本著名传记《西行漫记》

外,另一个同样经历长征、同样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伟大朋友的美国作者艾格尼·史沫特莱,也有一本广泛流传的作品《中国的战歌》〔北京〕作家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了中文译本。阅读《中国的战歌》,就不难知道长征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期待世界的理解与支持,也不难懂得为什么他们只能做出革命和造反的抉择,更可以想象由此联想革命年代的氛围与风骨如何持续影响了老一代革命领袖在新中国建立后一段时间的外交思维与决策。

[3]有关近现代史上世界列强对中国的凌辱、盘剥,以及中国外交的软弱应对,可参见熊志勇、苏浩著:《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一书中的详细描述和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4]这方面,可参见外交部档案专家徐京利的作品《另起炉灶——崛起巨人的外交方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尤其是第九章“打扫屋子的铁腕行动”,第272-313页。

[5]国外研究毛泽东的一个著名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发展总的线索有一种比较客观的判断。他指出:“总的结果是一种曲折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强调的重点是间歇性地一个时期强调阻碍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各种困难,一个时期又强调所有新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所固有的非凡力量,这种力量可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见〔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翻译出版,第241-242页。

[6]在笔者看来,中国外交学界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导向及其实践的评价,有清醒的、公允的和有共识的。可参见下列著作: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郝雨凡等编:《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7]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包括中国学者自己在内,对于中国是否算是全球大国的说法仍然众说纷纭。只是到了最近几年,特别是随着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和中国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三的事实的确,各方面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有全球利益和影响的大国的定位,才有了比较趋近的看法。然而,究竟这个全球大国是什么性质的大国,朝着何种方向演化,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成功与失败的前景如何,争论并没有完结。

[8]英国著名的世界经济史学者麦迪森(Angus Maddison)指出,从公元14世纪到20世纪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按人均收入和GDP来衡量,中国经济一直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这种停滞源于当地的制度和政策,但由于西方霸权的殖民剥削而被强化了”。这是自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史)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然而,从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世界经济史图表看,中国经济的恢复和活力又是特别抢眼的事实。在他制作的“中国与西欧人均GDP水平的比较(公元400年-1998年)”、“中国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比较(公元1700年-1998年)”等图表中,上述事实有清晰的显

现。他的结论之一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复兴的亚洲(包括中国、印度和其他所谓的‘亚洲虎地区’)已经极大地缩小了它们因落后产生的差距”。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图1-4和图16,第30-31页和第34页。同一作者的另一名著指出:1950年前后中国的人均GDP仅有西欧的十分之一左右(439 4579“国际元”),而到了2001年,西欧国家的人均GDP仅仅是中国的三倍半多一点(19256583“国际元”)。〔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

[9]参见张历历,前引书,第46-64页,“第六节新中国与各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和万隆促进会成功举行”。

[1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建立,便直接受益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上述批示。详细情况,可参见世经政所史编纂小组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四十年》2004年4月版。关于广义上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及其启动过程,联系文中叙述,读者可参见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11]应当承认,关于“文革”十年的中国外交,不管是指导思想还是行动策略或者是具体过程,中国外交学界的讨论是不够的,很多地方存在缺失与误判,有相当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认识。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总体上中国学术界对于“文革”历史检讨不够,存在许多政治敏感性和不方便深究的局面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也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外交学者有理由更加平心静气地、客观细致地研究和叙说这段历史。

[12]叶自成教授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及战略的分析,比较复杂也比较有辩证思想。他指出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一面,同时看到毛泽东内心中对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霸权的深刻不满与挑战意志,以及毛泽东外交谋略里面包含的复杂矛盾关系。参见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出处同前,第128-138页,“从中间地带论到第三世界论的发展”。

[13]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北欧地区各国(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被认为是提供的国际公共援助在其GDP中所占比重最高的国家群体。大体上,这些国家的国民和政府把百分之零点七左右人均GDP捐献给了国际和平进程,特别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各种地区热点冲突的调解过程,如有关中东和平的“奥斯陆进程”、有关斯里兰卡内战的调停过程、有关柬埔寨政治和解和联合国的介入过程、有关印尼政府与分裂省份亚齐相关政治势力的对话进程,等等。作为案例之一,下列作品可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它属于挪威政府发布的白皮书之一) LEIV LUNDE & HENRIK THUNE, ed.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Policy for a Globalised World, The Case of NORWAY, report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fleks Project, Dec.2008.

〔责任编辑 钱继秋〕